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3.012

# 文本向历史敞开的路径 ——伊格尔顿文艺形式观研究

王健, 谢思敏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形式是构成文本的重要一环, 伊格尔顿引入形式概念与意识形态相连接, 意图回答文本中被现存社会秩序遮蔽的话语问题。伊格尔顿反思英美新批评讨论形式问题时的精英主义立场, 重新将形式自上而下地与政治和社会相连接, 这种连接需在形式具体化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完成。在这一过程中, 历史事件被截取, 但虚构的文本却能够达到更高的真实。这种真实以由作者个人经历所决定的作者意识形态为基础, 能够打开被社会秩序所遮蔽的话语空间。遮蔽话语的还原需借助意识形态的意指作用, 审美批评则是还原的实践路径。伊格尔顿文艺形式观是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纵深发展, 并对如何解决英国本土社会问题进行了回应。

**关键词:** 伊格尔顿; 形式; 意识形态; 文本; 历史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3-0100-08

## Path of Text Opening to History: A Study on Terry Eagleton's View of Literary Form

WANG Jian, XIE Si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For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xt, and Eagleton introduces the connection of form and ideology to answer the discourse questions in the text hidden by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Eagleton reflected on the elitist position of the new British and American criticism of the form issue, reconnected the form with polit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This connection needs to be comple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 embodied into ideology, in which historical events are intercepted, but the fictional text is able to reach a higher truth. This reality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ideology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an open the discourse space covered by the social order. The discourse space's restoration requires the meaning of ideology, and aesthetic criticism is the practical path of restoration. Eagleton's view of literary form is a deep development of Marx's literary theory and a response to how to solve the social problems in Britain.

**Keywords:** Terry Eagleton; form; ideology; text; history

**收稿日期:** 2023-1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伊格尔顿理论的伦理问题与现实意义”(19FKSB022)

**作者简介:** 王健, 男, 山东成武人,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新时期思想史; 谢思敏, 女, 湖南涟源人,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国文论。

关于形式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伊格尔顿的形式观点来自英国传统理论,却又有一些不同,意识形态问题是这些不同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伊格尔顿所说的形式是文学范围内的文本形式,他的形式观是建立在形式本身是意识形态的能指这一基础之上的。形式在广义上来说属于意识形态术语,伊格尔顿谈形式问题就是借助于意识形态理论将形式的领域从文学导向政治。政治不仅意味着可见的政府治理工具,它同时也有人际社会权力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体现某一阶级价值理念的文学作品才具有文学资格,其形式亦应当体现某一阶级的思想价值。文本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历史的真实因社会秩序的遮蔽在一定程度上被截断或扭曲。伊格尔顿意图引入形式概念,将其与意识形态相连接,分析意识形态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从而将真实的历史打开,让文学能够真正地反叛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

国内对伊格尔顿形式问题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便已开始,具体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的关系、形式的政治批评等方面。关于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如黄茂文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之间——试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观》(2006)一文,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反本质主义的特征与限制,认为现代文学话语的生成及转变与西方社会和历史的变化有着以形式为依托的社会关联<sup>[1]</sup>;陈然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演变》(2015)一文,梳理了二者关系的演变,认为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总是与“什么是形式”“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任务”这三个更为一般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伊格尔顿的形式问题也是与这三个问题紧紧连接在一起的<sup>[2]</sup>;杜智芳《从形式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念》(2016)一文,认为从形式入手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念有四条路径:形式与历史、形式与技术、形式与乌托邦、形式与意识形态,而伊格尔顿的形式问题则是聚焦在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sup>[3]</sup>。形式的政治批评研究有程露的《文学形式的政治批评——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的文本解读》(2011)、张蕴贤的《重建文学形式维度——以伊格尔顿〈如何读诗〉为例》(2018)等。前

者认为,伊格尔顿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的政治性问题,认为文学形式能表现作者的政治态度,其主张避免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缺陷<sup>[4]</sup>;后者认为,伊格尔顿“后理论时代”转向文学形式的政治批评是对文化主义及历史主义的反思,与新形式主义一脉相承<sup>[5]</sup>。国内学者对伊格尔顿形式观的此类研究,虽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伊格尔顿有关形式及内容关系问题思考的研究,但并未解决伊格尔顿最初为何提出形式、形式是为解决怎样的现实问题、为解决现实问题其进行了怎样的努力等疑问。本文尝试更进一步地思考伊格尔顿意义上的文本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并梳理出他阐释形式以解决现实困境的路径:主导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掌控,其呈现形式对历史真相存在一定的遮蔽作用,作者意识形态因受作者个人经验的影响与主导意识形态存在分离之处,而文本凭借对作者意识形态的意指向历史敞开,实现对历史真实的还原;这种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可以打开未被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控制的话语空间。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不能离开实践空谈理论。检视伊格尔顿的形式观,不难发现,其文学审美批评并未脱离实践。他认为,在打开历史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立足现实并面向未来,而文学审美批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路径。

## 一、形式与现实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需对本文涉及的历史、史实、“史实”等概念作简明的梳理。马克思非常重视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他认为社会现实的形成是有原因的,并遵循生产力发展的线索。马克思的历史学说总是依附于社会现实的,其社会现实包含了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阐释和写作。前者我们称之为史实,后者我们称为“史实”。意识形态的构建总与历史阐释的形成密切相关,它包含史实及相关阐释性两个维度的内容。

伊格尔顿关注历史与现实问题有其现实基础及理论背景。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冷战的硝烟就已经蔓延到了英国的文化领域,伊格尔顿在 70 年代谈论意识形态问题时,全球正处于美苏冷战的白热化时期。为了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

限,凸显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英国左翼理论家开始复兴英国文化传统,主张寻找英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现实政治层面上,70年代也正是英国工党政治愈演愈烈的时期。受这一时代背景的影响,伊格尔顿继承了英国新左派对现实持续观照的责任感。其师雷蒙·威廉斯是新左派代表人物。为解决现实困境,威廉斯将社会关系、审美意识形态、政治和伦理等因素都糅合到“文化”这一概念之中。同样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伊格尔顿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威廉斯的思想与更早一些的剑桥学派代表之一F·R·利维斯的思想存在差异。利维斯区分了诗的“形式批评”与小说的“道德批评”,认为一部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及其对生活的开放性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强调文学要有社会责任感,并能够解决社会和历史问题。伊格尔顿看到了利维斯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也指出,这种责任感带有精英主义的阶级局限:“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利维斯的精英主义,不仅在学术思想上,也在实际中——他(利维斯)身处的唐宁学院周围的圈子、阿谀、非正统的正统性和威廉斯所支持的诸多观点的排斥。”<sup>[6]59</sup>

“意识形态”概念成为20世纪70年代伊格尔顿关注的首要对象亦有其历史原因及理论来源。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工党政治愈演愈烈的时期,左翼思潮亦正处于高潮阶段,这一历史语境为伊格尔顿批判理论的建立提供了颇多资源:

“跟我其他书比起来,《批评与意识形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历史的产物……当时我这样做无疑怀着对左派的满腔热忱,感觉写这本书有的是资源,有的是概念的活力,可以从任意的某处分析起。”<sup>[6]129</sup>在这种语境下,左翼思想的核心概念“意识形态”亦成为伊格尔顿理论建构的着眼点。阿尔都塞的作品对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者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他的结构主义思想是有关社会性的思考,也是他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根基,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等作品的创作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作为威廉斯的学生,70年代的伊格尔顿继承了其师将文学分析深入到更广阔的文化分析中去的思想视野,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意识形态理念之中。伊格尔顿突破了利维斯精英主义的局限,明显吸收了阿尔都塞唯物主义

批评程序的要素:“这本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部分内容确实如此,阐释了很多阿尔都塞的范畴。”<sup>[6]122</sup>其以文本为基点,描述文学作品与周围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伊格尔顿为何将视野落到“形式”之上?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关于形式的思想进入了伊格尔顿的视野:“我记得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一个很早期的观点着重强调形式的历史性,以及彻底严肃地对形式进行思考的必要。部分因为我相信形式的重要性,部分是出于战略需要。”<sup>[6]112-113</sup>另一方面,是因为伊格尔顿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流派所探讨的“形式”及其功能问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他既看到了这些理论的独到见解,也注意到了其中的局限性:“当时我对尝试抛弃与话语分析相联系的美学概念的做法进行抵制,部分因为我看到了俄国形式主义者 and 符号学家为此做的一些趣事。”<sup>[6]127-128</sup>

伊格尔顿重新建立起了“文学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是社会形态多元化复合的结果;形式是思想方式的具体化,可以表现出某种生产关系属性,并带有某种特定生产方式标志。“一个特定的文学生产方式,可能包含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生产方式的成分和结构。”<sup>[7]82</sup>文学生产方式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所有文学文本的内在特征,它亦囊括文本的外部限制功能,因此,文学外部的“形式”问题亦是揭示特定时代生产方式继而思考并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条可能路径。例如,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试图通过简化表达形式的方式扩大革命宣传的范围,从而以思想革命为基点完成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伊格尔顿通过阐述形式的意识形态问题,意图完成社会性的再生产并将其导向囊括人际社会权力的政治。他认为,文学的形式问题最终应与政治相连接,应解决现实问题;文学也应是穷人的文学。他提出:“因此,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机师学院、工人学院和大学附属业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这一现象意味深长。”<sup>[8]30</sup>

## 二、形式与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对形式与现实关系问题的探究建立在他对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之上。他试图



在文学文本、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影响机制。或者说,伊格尔顿对文本及其形式的再思考是通过辨析其内在结构的相互作用而完成的。作者意识形态以嵌入整个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与主导意识形态结合。主导意识形态与作者意识形态都指向社会现实,但二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与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相勾连,其阐释范围是整体性的;后者除与阶级利益相联系之外,其建构以个体认识、体验及生平经历为基础。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主导意识形态可能会存在分离之处:“在一般意识形态和作者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有效同源的一致性、部分分离和严重对立的诸种关系。”<sup>[7]100</sup> 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遮蔽功能,我们看到的只是经过社会集团处理加工后的产物,但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并不会完全被遮蔽甚至可能会出现与主导意识形态严重分离的情况。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在文学当中,这就是超越和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起点。

伊格尔顿为何能看到这种被遮蔽的话语?这与伊格尔顿个人成长及受教育经历密切相关。童年时期的伊格尔顿受爱尔兰共和主义的政治影响,曾写过充满英雄情绪的爱尔兰歌曲:“所以,我的政治不满感一开始不是源自阶级,而是源自爱尔兰问题。”<sup>[6]10</sup> 青年时期,出身于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伊格尔顿看到了无产阶级被压迫的现状:

“当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一说到统治阶级,我就有种愤懑不平感。见到他们,只会强化我的偏见。”<sup>[6]19</sup> 进入剑桥大学后,伊格尔顿加入剑桥大学左派论坛,第一次参与市民政治活动时,就成功地将市里相互隔绝的工人联合起来了。在牛津大学马克思主义研讨班上,他经常主持研读马克思著作:“起初,(马克思主义)围绕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而进行……研讨班所讨论的知识内容会有变化。它的变化过程与广泛的政治历史相联系。”<sup>[6]91-92</sup> 马克思对被遮蔽话语的关注,逐渐进入伊格尔顿的视野。

伊格尔顿意图借助形式与意识形态连接来进行反抗。在明确怎样进行反抗前,我们需梳理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伊格尔顿看来,文本与意识形态通过形式技巧确立了某种共同影响的联系,这种关系使人们能够感受到文本得以生

产的意识形态的概况。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形式技巧的功能,去理解和感受文本赖以产生的意识形态因素。他认为,通过形式的重构转化作用,意识形态潜藏在了文本当中,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通过分析文本中显在的形式,可以发现其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形式,我认为,总是至少由三个要素构成:它被形式的‘相对自主’的文学历史影响;它具体化为特定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正如我们在小说中见到的例子一样,随后,它具体化为读者与作者的特定关系。”<sup>[9]25</sup> 另一方面,一些形式直接体现了特定历史环境的意识形态,理解某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理念,就可以分析出该时期文本形式的构成原因。例如,中世纪文学整齐和谐的对仗和倒装,就是由当时秩序严明、等级明显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理论定位同样是“形式的意识形态”,他通过阐释形式与内容具有同构性从而连接了形式与意识形态,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所要强调和关注的是体现文本内部规律的“内部形式”。与之不同,伊格尔顿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内核。这样一来,他就避免了形式主义“纯文学”精英主义的窠臼,也避免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过度强调内容的呆板倾向,让马克思主义批判再焕生机,恢复了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建构作用。

通过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就有了一种间接的联系。伊格尔顿关于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观点来自本雅明的启示——艺术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扮演的是生产者的角色,而艺术的欣赏者则为消费者。正如社会产品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消费行为的存在一样,文本之所以为文本,是因为其需要通过阅读来实现,而文本的消费过程是由一般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文学文本之所以是文本(相对于‘书籍’来说),在于其被阅读;正如其他社会产品一样,消费行为本身即是其存在的要素。”<sup>[7]105</sup> 在伊格尔顿看来,如果形式不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亦会有差异,形式在文学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起到了衔接的作用。形式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生产者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生产文学作品并直接影响其形式的表现,形式直接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生产关系。生产者和

消费者作为社会上的人,自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二者的影响之下,形式也间接地带上了意识形态属性。

不难看出,在伊格尔顿的文艺思想中,形式与意识形态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生产方式、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影响机制;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不仅存在直接相互指向和影响辩证关系,通过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还存在间接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形式在具体化为意识形态结构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史实的截取,对这一截取史实的还原是实现反抗的必经之路。

### 三、形式的具体化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揭示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和形式在实践上是统一的而在理论上是区分的。这样一来,在理论层面上就可以分析二者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伊格尔顿认同马克思的美学观念,即完全脱离于内容的形式是无价值可言的。“形式被具体的‘内容’历史化地决定,它们随着内容本身的变化而改变、转化、毁掉和复兴。”<sup>[9]21</sup>从这一个角度来说,伊格尔顿认为内容优先于形式而存在。

那么,形式作为次于内容的附属概念是否可有可无?答案是否定的。这一思考明显地体现在伊格尔顿对以考德威尔为代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上,这一反思也是伊格尔顿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机而进行的有益尝试。考德威尔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诗歌是一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幻象,由现实和劳动催生,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内容并不具备形式。他将形式视为一种固有的限制。伊格尔顿认为,考德威尔的观点缺乏一种辩证的思维,考德威尔的看法仅仅只是“艺术造成了现实的混乱”这一资产阶级话语的变体。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形式不仅仅是内容原材料生产的过程,形式还存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在伊格尔顿看来,考德威尔的思想是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继承。伊格尔顿通过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批判构建了《批评与意识形态》的理论起点:

“但即使考德威尔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最主要的开创者——至少他的计划在全然不惧、非凡抱负方

面是‘主要的’,事实上,除了有着负面影响外,从他身上能获得的东西寥寥无几。”<sup>[7]42</sup>在明确形式地位的基础上,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进一步提及,形式至少是三个部分的复杂混合:它在特定的文学历史中形成、具体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结构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具体关系。

形式具体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结构在伊格尔顿这里通过阐明其意指实践而得到了再阐释。“意指”这一概念在结构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最初的阐释。索绪尔主张立足于文本自身的结构,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不是任意的。他把语言视为一个一旦形成就稳固下来的系统,这直接催生了结构主义理论。罗兰·巴特作为“结构主义之母”,试图建立一种通过研究文本意指功能来揭示意义生成过程的科学,他在索绪尔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意指的第二系统。在他看来,第一系统构成直指的平面,而第二系统构成的则是含蓄性意指的平面。如“玫瑰”一词,不单单指的是一种花朵,也可以含蓄地指向“爱情”这种人类的情感,“玫瑰”和“爱情”都是一个意指的系统:“一个被含蓄意指的系统是一个其表达面本身由一意指系统构成的系统。”<sup>[10]</sup>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为,能指指向所指的过程和路径即为意指。虽然巴特对文学的科学性的探索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他对精密逻辑分析框架的追求和崇拜使他深陷于结构的图囿之中。

伊格尔顿意义上的意指相对结构主义的意指来说有所突破。他认为,正因为文本真正指涉物的缺失才构成了文本最突出的特征即虚构性。所指内容变虚拟时意指过程被突出和加强,这个过程类似于形式主义者所说的“间离”和“陌生化”。在这一过程中,主导意识形态与作者意识形态有了走向分离的可能,诗歌就是这种过程的典型例证:“传统上被称为‘典型的’文学话语——至少通常被认为是此类话语的诗歌——其典型特征就是能指所指之间的规范关系受到了这样的‘干扰’。干扰的效果就是突出或加强意指实践本身,从而产生形式主义者所说的经验的‘间离’。”<sup>[7]130</sup>再以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为例,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作品打着貌似有客观所指的幌子,但其作为“小说”的身份又揭开了所指被隐藏的真相,即“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带有的虚构性使其所指实际上



是虚构的。例如,《高老头》对伏盖公寓的细致描写,使得读者误以为确实存在这个地方,但其小说的身份则暗示了它是虚构的。不过,其揭示的资本主义面貌却给人超脱于现实的更为真实的感觉。换句话说,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其对历史的直接或间接指涉需建立在其生产的现实背景基础之上。受作者个人经历的影响,作者意识形态对史实的说明与主流社会秩序存在分离之处,经由作者意识形态的中介,被主导社会秩序所遮蔽的空间有了被打开的可能。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会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说,伊格尔顿避免了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者只聚焦于文本形式的窠臼。值得注意的是,虚构性只是促成文学完成其能指使命的手段,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在于其指向的意识形态:“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不是其虚构性——18世纪严重怀疑迅速兴起的小说的文学身份——而是其是否符合某种‘纯文学’标准。换言之,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sup>[8][19]</sup>

在英美新批评者看来,由于文本以自身为产品,文本的意指是一场自由的游戏。他们的认知基础是个体性的,其意图利用个体性的经验对抗商品化的世界,但由于他们忽视了个体经验产生的阶级背景和广阔的社会整体,因而无法自上而下解决现实问题。在伊格尔顿看来,形式的意指并不是一场自由的游戏,形式在意指过程中指向意识形态,而由于作者带有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的参与,“史实”完成了表面上的虚构和事实上的真实。伊格尔顿的这一思考是集体性的,具有超脱于英美新批评精英主义立场改变社会秩序的革命性。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伊格尔顿对比了史学研究作品和文学作品。“按照常理,史学研究作品对其意义的组织是为了获得对史实的‘客观’记述,但是它往往做不到这样,这是因为对该史实的意识形态建构取决于其话语特征。”<sup>[7][123]</sup>虽然史学研究作品以获得对史实的客观记述为目标,但是,对某一史实的意识形态构建取决于其话语特征,因此,史学研究作品并不能完全获得对史实的客观记述。文学与之不同,文学话语并不以史实作为其直接对象,而是加工意识形态方面的形式和素材。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史实的疏离恰

恰给予了文学自由的空间:由于史实被截取,文本指向的是由具体境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形构。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指向恰恰是文本最有意义的所指,因此,文学作品的内容比历史作品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会更丰富,这种丰富给人更真实的感觉。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看似能够自我生产和自我决定,但由于史实被疏离,这种自由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掩盖作用所产生的结果,随心所欲地捏造史实是不可能的。因而,文学文本的虚构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意识形态渗透的产物。

在伊格尔顿这里,形式的具体化逐渐明晰。形式在意指过程中以指向意识形态为结果,文本是作者意识形态的体现,其在表面上是虚拟的,但隐含的内容却给人真实的感觉。审美实践批评对历史的还原类似于“间离”所产生的效果,能够达成更为有力的反叛。

#### 四、形式向历史的敞开

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并非永恒不变,因为现实本身是变化的。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建构和解构的关系:文本用其语言重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被塑造或被拆解。文本的结构并不是对意识形态静态反映的结果,而是在这种永不停歇的相互作用和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结果。这样,文本就保持着对现实世界持续观照的能力。

文本能保持对现实持续观照的能力,在于其是作家不断更新的“思想具体”的外化。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中,现实历史对象之外的头脑是完成历史的场所,主体对历史思辨的结果是史实的实在部分。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之间的差距,认为其是进入头脑当中的一种“思想具体”,既非现实对象也非纯粹思维。这样一来,关于历史的认识就打破了经验论的认识模式。伊格尔顿对历史的认知离不开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文本中的“史实”绝非史实的简单再现,而是头脑中“思想具体”的表现。受作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思想具体”随作家的创作实践外化于形并与历史形成动态联系。

作者“思想具体”的外化与意识形态及历史的动态联系在伊格尔顿看来恰恰是文本的“真相”:“文本的‘真相’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实践——

文本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与历史关系的实践。”<sup>[7]160</sup>这种“真相”能够将史实放入视野进行重新审视。伊格尔顿敏锐地关注到了文本中的“史实”。在他看来,文本可能谈及真实的社会现实,而历史则是对社会现实某种程度的窄化。也就是说,文本谈及历史。

文本中的“史实”并不意味着真实记录。伊格尔顿认为,作者涉及真实的社会现实或者说史实时,其处理方式是虚构的:操作者需要按照文本生产的规则对现实材料进行操作和处理,史实依照操作者的意识形态嵌入模式进行文本的生产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入文本。在进入文本的过程中,史实被不同程度地扭曲、缺失和虚构。事实上,文本正是以逃离社会现实的形式来完成对现实真实的表现,虚构性的文学作品经常给人超乎史学作品的真实感。文本以史实的截取和虚构来完成真实,这些被还原了的真实恰恰就是群众反抗的资本: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扩大到多人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未被主导意识形态遮蔽的。因此,伊格尔顿意图借助文本打开被遮蔽的史实以还原真实。他认为,文学应将视野放到更为整体性的资本主义批判中去,打开被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遮蔽的真实。

历史作为意识形态进入文本并被文本所截取,文本呈现出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美学创作模式。这些创作模式由意识形态采纳的结构形式所决定和表现,而这些创作模式或者说形式可能与历史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般形式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文本通常就是这些复杂的美学创作模式的混合体。因此,文本与历史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文本呈现给我们的是对史实的颠覆和抗拒,在文本当中,史实是缺位的。那么文本该如何向历史敞开,打开被资本主义遮蔽了的历史的真实呢?

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包括史实在内的社会现实的意指,因此,文本要与史实真相发生关联,就必须借助意识形态的意指作用。通过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历史在文本内部操作文本,意识形态就被赋予了主导的特权。文本加工后作为现实的表象而非现实本身,这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伪史实”的假象。文本中对史实的描述是想象的结果,因为它涉足的是创作者关于史实的意识形态经验而非真实的史实。这并不是说

要通过“形式”的需求来选择“内容”,恰恰相反,“形式”本身是从作为意识形态的预先形成的“内容”被选择的。作家在进行文学生产时,释放特定的史实,并用情境的形式最大程度地进行排列组合,以超出一成不变的现实世界,这些超出的部分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它来自社会秩序中被遮蔽的群体,是被忽视话语的发声。

史实经由意识形态作用在文本中呈现的形式是多样的,其还原需经审美实践批评。意识形态通过日常语言、象征表现自身,其即使是以美学、政治、伦理等更为正式的方式呈现,也需要直接由日常语言来表现:“通过形式手段,文本建立了与意识形态的变形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感知通常被掩盖的、文本从中产生的意识形态轮廓。”<sup>[7]137</sup>文本通过形式与意识形态建立联系。虽然文本的形式最终由意识形态问题域的范畴结构所决定,但在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中,文本赋予意识形态以形式,批评则是揭示意识形态与历史之间间隙的实践手段:“批评的任务是要展示文本是如何被其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掏空’的,即它如何通过让意识形态起作用而被迫面对由意识形态与历史的联系而造成的间隙与限制。”<sup>[7]147-148</sup>与伊格尔顿一致,詹姆逊认为,辩证批评的具体方式是要追查出其言说方式以及被意识形态所覆盖的史实。与伊格尔顿不同的是,詹姆逊在阐述文本与史实的关系时引入了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詹姆逊以“叙事-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作为出发点,认为辩证批评的目标是要探究文本中主导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压抑性质。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强大作用会在使文学艺术发生变形后保留在文本的“内部形式”当中,而辩证批评的目标便是发现隐藏在“内部形式”的变型。詹姆逊将引入的精神分析法与意识形态批评相结合,认为压抑机制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层面,而这种压抑的成果则体现在文本的叙事当中。毫无疑问,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的意识形态观都来源于马克思,都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化和再阐释。他们都试图通过自身实践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所引发的深刻危机,两个人都在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些因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系。

由此,伊格尔顿对何谓文本向历史敞开的路径



给出了答案: 文本批评是揭示形式向历史敞开的实践路径, 这种实践路径可以揭示未被社会意识形态遮蔽的作者意识形态, 从而达成对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反叛。文本批评分析出文本与意识形态冲突的产生、解决与再生产过程, 揭示了文学文本的自然存在并分析出其真实的决定因素。

“审美”根据由审美本身决定的多元意识形态决定因素来生产意识形态, 文本向历史敞开的路径由意识形态连接而成, 并在意识形态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凸显。在文学批评分析出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意义建构模式的过程中, 文本同时也间接阐明了意识形态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形式本身作为文学批评中意识形态的载体, 使得意识形态的展现更加明晰, 从而为文本向历史敞开搭建了桥梁。

人从诞生那一刻起, 就无法脱离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 作为社会中的个人, 我们无法脱离特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而存在。伊格尔顿继承新左派关注现实的思想视野, 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文本向历史敞开的可能路径, 英国的左翼思潮为他的这条路径提供了以“意识形态”为中介的方向。

为解决现实问题, 达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反抗, 伊格尔顿的视野落到了马克思及英美新批评对“形式”概念的思考之上。文学文本带有特定生产方式的标志, 而文学生产方式并不仅仅局限于所有文学文本的内在特征, 它亦囊括了文本的外部限制功能。因此, 文学外部的“形式”问题是思考并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条不可忽视的路径。伊格尔顿的文学形式观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范畴展开论述的。他认为, 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文本因形式而带有的意指功能指向“具体境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形构, 这种意指的完成是通过特定史实的缺位而完成的。在文学批评分析出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意义建构模式的过程中, 文本同时也间接阐明了意识形态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 文本向历史敞开的路径就明晰了。

后期的伊格尔顿对“形式”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他针对“后理论”时代的理论症候, 进一步反思了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的缺陷, 重新界定了“形式”的范围。他不仅仅建立了“形

式的政治”, 还将肌质、意象等因素纳入形式的范畴, 主张以“形式”的方式恢复人的感性体验, 用以对抗商品化、资本化的世界,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向度。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伊格尔顿的文学形式观揭示了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历史之间的动态关系。与马克思的思考的不同处或者说突破处在于, 伊格尔顿将视野聚焦于英国本土内部, 希冀以“形式”作为意识形态的附属概念用以连接个人和社会, 并解决英国本土的阶级问题, 以更好地面向未来。伊格尔顿前期的文学形式理论虽带有意识形态泛化倾向, 但他以锐利的眼光审视美学问题, 其理论因而具有极大的现实开放性。他用自身的理论视野和批评实践彰显了桀骜不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 其对文学形式的思考亦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纵深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黄茂文. 在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之间: 试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观[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8(4): 1-5.
- [2] 陈然兴.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演变[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5(1): 97-103.
- [3] 杜智芳. 从形式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念[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2(3): 313-318.
- [4] 程露. 文学形式的政治批评: 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的文本解读[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33-38.
- [5] 张蕴贤. 重建文学形式的政治维度: 以伊格尔顿《如何读诗》为例[J]. 当代文坛, 2018(2): 62-66.
- [6] 特里·伊格尔顿, 马修·博蒙特. 批评家的任务: 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M]. 王杰, 贾洁,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7] 特里·伊格尔顿. 批评与意识形态[M]. 段吉方, 穆宝清,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21.
- [8] 特里·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9] EAGLETON T.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M]. London: Taylor&Francis e-Library, 2003.
- [10] 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 李幼蒸,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170.

责任编辑: 黄声波